

目 次

一八八九年

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 /3

一八九〇年

贼 / 69

古塞夫 / 87

一八九一年

村妇 / 105

决斗 / 120

一八九二年

妻子 / 239

跳来跳去的女人 / 287

散戏以后 / 314

一鳞半爪 / 318

一家商号的历史 / 320

在流放中 / 324

摘自老教师的札记簿 / 334

鱼的爱情 / 336

邻居 / 339

第六病室 / 359

题解 / 417

一八八九年

没意思的故事

摘自一个老人的札记

—

在俄罗斯，有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是三等文官，勋章获得者。他有那么多俄罗斯的和外国的勋章，每逢他必须把它们一齐戴在胸前的时候，大学生就管他叫做“圣像壁”。他所结交的人物都是最赫赫有名的，至少，近二十五年或者三十年以来俄罗斯的知名学者没有一个不与他有过亲密的交往。现在他没有可交的朋友了，可是讲到过去，他的著名朋友的长名单却是以皮罗戈夫^①、卡维林^②、诗人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名字结尾的，这些人都跟他有极为真诚、亲切的友谊。他是俄罗斯所有的大学和三个外国大学的委员。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所有这些，再加上许多也值得一提的事情，就构成了我的所谓名声。

我这个姓名是人人都知道的。在俄罗斯，凡是能读会写的人都知道。在外国，大学讲坛上提起它的时候，总要冠上“著名的、可敬的”这类字眼。这个名字归在少数幸运的名字当中，如果有人在公共场合和报刊文章里辱骂或者滥用这些名字，就会被人看作品格不佳的表现。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要知道，我的名字是跟名望很高、极有天赋、无疑有用的人的观念紧密联系着的。我像骆驼那样勤恳耐劳，这是重要的，而且我有才能，这

就更重要了。此外，我要顺便提到，我是一个有教养的、谦虚而正直的人。我从来没有钻到文学和政治方面去出过风头，也没有贪图名望而跟不学无术的人进行过论战，更没有在宴会上或者我同事的坟墓上发表过演说。……总之，我的学者名声没有一星污点，对我的名声谁都没话可说。这是幸运的。

享有这种名声的人，也就是我自己，却是一个六十二岁的男子，头顶光秃，镶了假牙，害一种医不好的面部痉挛症。我的名声光辉灿烂，我的模样却灰溜溜的，极其难看。我的头和手衰弱得发抖，脖子跟屠格涅夫的一个女主人公^③那样，像是大提琴的柄，胸脯凹陷，背部狭窄。我说话或者讲课，嘴角总是往一边撇。我一笑，脸上就布满衰老的、死气沉沉的皱纹。我这种可怜的模样没有一点动人的地方，也许只有在我面部痉挛症发作的时候，我才会有一种特别的表情，惹得人家看见了必定会生出阴森而难忘的想法：“这个人大概不久就要死了。”

我讲课跟过去一样，仍旧不错。我照旧能够一连两个钟头抓住听讲人的注意力。我的热情、我在讲解方面的文学技巧、我的幽默，差不多遮盖了我声调的缺陷，因为我的声调干巴巴、尖得刺耳，可又抑扬顿挫，跟假善人一样。我写文章却不行了。专管写作能力的那一部分脑子不听使唤了。我的记忆力衰退，思想不大连贯，每逢我把思想写在纸上，总觉得我已经失去一气呵成的本领，结构单调无味，语言贫乏拘谨。我常常词不达意，写到结尾忘了开端。我往往忘记常用的词，写信的时候我总是费不小的劲才能避免多余的句子和不必要的插入句，这显然证明我的智力活动衰退了。值得注意的是信越简单，写起来倒越费劲。我写科学论文反而觉得比写贺信或者报告容易得多，也通顺得多。还有一点：我觉得用德文或者

① 皮罗戈夫(1810—1881)，俄国外科学家、解剖学家。

② 卡维林(1818—1885)，俄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政论家。

③ 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一个多余人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俄文本编者注

英文写比用俄文写容易。

讲到我的生活方式，我先得提到近来常犯的失眠症。要是有人问我现在生活中主要的和基本的特点是什么，我就要回答：失眠症。跟过去一样，我按照习惯，一到午夜就脱衣上床。我很快就睡着了，可是不到两点钟又醒来，觉得好像根本没睡着过似的。我只好下床，点上灯。我在房间里走上一两个钟头，从这个墙角走到那个墙角，瞧着早已看熟的照片和画片。我走得腻味了，就在桌旁坐下。我一动不动地坐着，什么也不想，什么欲望也没有。要是有一本书摆在我面前，我就顺手拿过来，一点也没兴趣地看下去。前不久我就是照这样在一夜之间心不在焉地看完整整一本题目古怪的长篇小说：《燕子唱的是什么》^①。或者，为了集中我的注意力，我就逼着自己从一数到一千，再不然，我就想我的一个同事的脸，极力回忆他是在哪年，在什么情形下，来教书的。我喜欢听声音。一忽儿，我的女儿丽扎在跟我相隔两个房间的一间屋子里很快地说了句梦话，一忽儿，我的妻子举着蜡烛穿过客厅，而且总是把火柴盒掉在地下，一忽儿，干裂的木橱噼啪一响，或者灯头忽然呜呜作声，不知什么缘故，所有这些声音都惹得我兴奋。

晚上老睡不着觉，就会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因此我心急地巴望天亮和白昼，到那时候我就有权利不睡了。要挨过许多难熬的钟头，公鸡才会在院子里啼起来。它第一个给我带来好消息。它一叫，我就知道不出一个钟头楼下的看门人会醒来，使劲地咳嗽，上楼来拿什么东西。然后窗外天色渐渐发白，街上传来人声了。……

白天刚一开头，我的妻子就走进屋来。她走来看我，总是穿着衬裙，头也没梳，不过脸已经洗过，冒出花露水的气味，装出仿佛偶尔走进来的样子，每回老是说那一套话：

^① 这是德国作家弗里德里希·施皮尔哈根(1829—1911)的一部长篇小说。——俄文本编者注

“对不起，我只在这儿待一分钟就走。……你又是一夜没睡吧？”

然后她熄了灯，在桌旁坐下，谈起话来。我不是先知，可是我事先总知道她会谈什么。每天早晨老是那一套。她不安地问过我的健康以后，照例忽然提起我们的儿子，在华沙服役的军官。每个月到二十号以后，我们总要汇给他五十卢布，这就成了我们的主要话题。

“当然这在我们是不容易的，”我妻子叹着气说，“不过，在他还不能完全自立以前，我们也不得不接济他。孩子在异乡服役，薪饷又少。……不过呢，要是你乐意的话，下个月我们不汇给他五十，汇四十算了。你觉得怎么样？”

日常的经验本来应该使妻子相信：我们的开支是不会因为我们常常谈到它就减少的。可是我的妻子不肯承认经验，每天早晨必定要谈到我们的军官，还要谈到，谢天谢地，面包落价了，糖却贵了两个戈比，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在向我报告什么新闻似的。

我听着，顺口答应一声，而且大概因为我一夜没睡觉吧，我的脑子里满是古怪而不必要的思想。我瞧着我的妻子，总是像孩子那样吃惊。我纳闷地问我自已：这个肥胖、笨拙的老太婆，一肚子琐碎的烦恼，为区区一小块面包担惊受怕，总是露出一副蠢相，再加上经常为债务和贫穷操心，眼光也变得迟钝，而且一开口只会谈家中开支，必得东西落价才见笑容；难道这样一个女人就是当初那个清秀的瓦丽雅？那时候我热烈地爱上她，是因为她头脑聪明，心地纯洁，面貌俊美，并且如同奥赛罗爱苔丝德蒙娜^①那样，因为她“看重”我的学问。难道这个女人就是当初给我生下一个儿子的我那妻子瓦丽雅？

我注意地瞧着这个皮肉松弛、笨手笨脚的老太婆的脸，想在她身上找到我的瓦丽雅，可是如今，过去的瓦丽雅所保存下来的只有那么一点：为我的

^① 莎士比亚所著剧本《奥赛罗》中的人物。

身体担忧，把我的薪水叫做“我们的”薪水，把我的帽子叫做“我们的”帽子。我瞧着她，心里很难过，为了多少给她一点安慰，我总是随她爱说什么就说什么，遇到她不公平地批评别人，或者怪我不私人行医或者出版教科书的时候，我甚至一声不吭。

我们的谈话也有老一套的结束方式。妻子忽然想起我还没喝茶，心慌了。

“我干什么管自在这儿坐着？”她站起身来，说。“茶炊早就摆在桌子上了，我却在这儿闲聊天。主啊，我的记性变得多么差！”

她赶快走出去，可是在门口又站住，说：

“我们欠下叶果尔五个月的工钱了。你知道吗？听差的工钱不可以拖欠，这话我说过不知多少遍了！每个月给十个卢布总比每隔五个月给五十个卢布容易得多！”

她走到门外，又站住，说：

“我觉得再没有人像我们的苦命的丽扎那样可怜了。这姑娘在音乐学院读书，经常出入上流社会，可是上帝才知道她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那样的皮大衣，她都不好意思穿着上街了。如果她是别人的女儿，倒也罢了，可是人人又都知道她父亲是一位名教授，三等文官！”

她把我的名望和官阶糟蹋一顿以后，总算走了。我的白天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以后，也不见得好过些。

我正在喝茶，我的丽扎向我走来，穿着皮大衣，戴着帽子，拿着乐谱，已经完全准备好，要到音乐学院去了。她二十二岁。她的模样显得还要年轻一点，长得漂亮，有点像我妻子年轻的时候。她温柔地吻我的鬓角和手，说：

“早，爸爸。你身体好吗？”

她小时候很喜欢吃冰淇淋，我常得带她上糖果店去。在她心目中，冰淇淋是一切美好东西的范例。要是她想称赞我，她就说：“你是奶油冰淇淋，爸爸。”我们常把她的这一个小手指头叫做开心果冰淇淋，另一个叫做奶油冰

淇淋，第三个叫做马林果冰淇淋等等。往常她来问我早安，我总要把她抱起来，放在我的膝头上，吻她的小手指头，说：

“奶油冰淇淋……开心果冰淇淋……柠檬冰淇淋。……”

现在呢，拗不过老习惯，我还是吻着丽扎的手指头，喃喃地说：“开心果冰淇淋……奶油冰淇淋……柠檬冰淇淋。……”可是我的声音完全不一样了。我冷冰冰，就跟冰淇淋一样，自己也觉得难为情了。临到我女儿走到我面前，用嘴唇碰一碰我的鬓角，我却打个冷战，好像有一只蜜蜂螫了我的鬓角似的，我勉强笑一笑，把脸扭开了。自从我害失眠症以来，有一个问题像钉子那样钉在我的脑子里：我女儿常常看见我这个老头子，这个名人，为了欠仆役的工钱而痛苦得满脸通红，她也看见由小小的债务带来的烦恼常常逼得我放下工作，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连走上好几个钟头，想心事；可是为什么她就从来没有一回瞒着母亲，悄悄地来到我的身边，凑着我的耳朵小声说：“爸爸，拿去吧，这是我的表、镯子、耳环、衣服……。把它们统统拿去典当了吧，你要钱用……”？她既然明白她母亲和我要面子，极力把我们的贫穷瞒住外人，那她为什么不放弃学音乐这种昂贵的享受呢？我不会收下她的表、镯子，也不会要她牺牲音乐，求上帝保佑我，我所需要的并不是这些。

同时我也想起了我的儿子，那个在华沙的军官。他是个聪明、正直、头脑清醒的人。可是我觉得这是不够的。我想：要是我有个老父亲，要是我知道有些时候他穷得害臊，那我就会把军官的职务交给别人去干，自己情愿做雇工。关于孩子的这一类想法败坏了我的情绪。这样想有什么好处呢？只有心胸狭窄、满怀愤恨的人才会因为普通人不是英雄而对他们抱恶感。可是，这些不提也罢。

到九点三刻，我得去给我那些可爱的孩子们讲课了。我穿好衣服，顺着街道走去。这条街道我走了三十年，对我来说它已经有它自己的历史了。那儿是一所灰色的大房子，开着一家药店，这儿从前是一所小房子，开着一

家啤酒店,我就在那啤酒店里构思我的学位论文,给瓦丽雅写第一封情书。我是用铅笔在一张上端标着“病历”^①字样的纸上写的。那儿有一家食品杂货店,当初是一个犹太人开的,他赊给我纸烟,后来由一个胖太太经营了,她喜欢大学生,因为“他们人人都有娘”,现在呢,那里面坐着一个红头发商人,他是个十分冷漠的人,用铜茶壶喝茶。这儿是大学的破败的、多年没修过的大门,穿着羊皮袄、烦闷无聊的看门人,笤帚,一堆堆的雪。……在一个新从内地来的、生气勃勃的、以为科学的宫殿真是宫殿的孩子们的心上,这样的大门是不会留下什么良好印象的。一般地说,在俄罗斯悲观主义的历史上,大学校舍的颓败,走廊的阴森,墙上的污迹,光线的不足,台阶、衣帽架、凳子的凄凉的模样,在造成这种倾向的众多原因当中占首要地位。……那儿是我们的校园。我觉得从我做大学生的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它既没变得好一点,也没变得差一点。我不喜欢它。要是拔掉那些病恹恹的菩提树、枯黄的金合欢、剪了枝的稀疏的紫丁香,在那儿栽上高高的松树和好看的橡树,那就合理多了。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学生的情怀是由环境造成的,那么他们在求学的地方无论走到哪儿,眼前所看见的只应当是高大的、健壮的、优雅的东西才对。……求上帝别让他们瞧见那些细瘦的树木、破碎的窗子、灰色的墙壁、蒙着破烂漆布的门才好。

我一走到平时进出的门廊,门就打开了,我碰到了我的老同事,跟我同年龄、同名字的看门人尼古拉。他一面把我让进门去,一面嗽着喉咙说:

“天好冷啊,您老人家!”

或者,如果皮大衣湿了,他就说:

“下雨了,您老人家!”

然后他跑到我前面,把一路上所有的门都替我推开。到了我的办公室

^① 原文为拉丁语。

里，他就小心地为我脱掉皮大衣，趁这机会跟我讲点大学里的新闻。大学里所有的看门人和校工彼此都十分熟悉；因此全校四个系、办公处、校长室、图书馆里出了些什么事，他都知道。他有什么事情不知道呀！遇到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大事，比方说，校长或者系主任辞职了，我就听见他跟年轻的校工聊天，谈到补缺人的名字，而且说某某人不会得到部长批准，某某人自己又不肯接受这个职务，然后捕风捉影地、详尽地谈到办公室里接到了神秘文件，部长和督学大概在进行秘密谈话等等。如果把那些细节除外，他的话差不多总是对的。他对每个补缺人都形容一番，那种形容是别致的，可又正确。要是您想知道某人在哪年宣读学位论文、开始教书、退休，或者去世，那尽可以靠这个老兵的广博记忆来帮忙。他不但会告诉您哪年哪月哪天，还会讲到这件事或者那件事的经过情形。那样的记性是只有满怀爱心的人才会有。

他是大学传统的保护人，他由前辈的看门人那里接受了许多大学生活掌故这样一份遗产。他还给这份财富添上他自己在服务期间得来的许多宝贝。要是您想听，他就可以给您讲许多长长短短的故事。他会讲到有些了不起的学者什么都懂，有些出色的刻苦钻研的人一连几个星期不睡觉，很多的人为科学受难和牺牲。在他看来，善战胜恶，弱者永远征服强者，聪明的征服愚蠢的，谦虚的征服骄傲的，年轻的征服年老的。……那些传说和故事，人也不必都信以为真，不过把它们滤一下，您就会在滤器里找到您需要的东西：我们的优良传统和大家公认的真正的英雄的名字。

在我们这班人当中，学术界的全部新闻只限于某些老教授精神异常恍惚的趣闻以及关于格鲁别尔^①、关于我、关于巴卜辛^②的两三个笑话罢了。可是对于知识界来说，这点消息未免太少。要是我们知识界都像尼古拉那样热爱科学、科学家、学生，那么早就会出现有关它的写成文字的完

① 格鲁别尔(1814—1890)，俄国医学教授，解剖学家。

② 巴卜辛(1835—1891)，俄国生理学家。

整的史诗、故事、言行录了，可惜这样的文献直到现在还没有。

尼古拉跟我讲完新闻以后，就做出一脸的严肃神情，我们开始谈正事了。要是在这种时候有个外人听到尼古拉随口说出许多学术名词，那他也许会以为尼古拉本来是个学者，却假扮成一个兵。顺便说一句，关于大学的校工有学问的传言是大大夸张了的。不错，尼古拉知道一百多个拉丁词，会把骨架拼凑起来，有时候还会准备实验标本，引一句课本上的文绉绉的长句逗学生发笑，可是，举例来说，对血液循环这种绝不复杂的原理，他现在仍旧跟二十年前一样茫然无知。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的解剖员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坐在桌子边，低下头在看一本书或者一个实验标本。他是个勤恳谦虚、可是缺乏才能的男子，年纪在三十五岁上下，头顶已经光秃，肚子已经大了。他一天到晚工作，看许多书，凡读过的都记得清楚，在这方面他简直不是人，而是金子。在别的方面呢，他就只能算是一匹拉货车的马了，或者换句话说，是个书呆子。他眼界狭隘，只注意他的专门学识，一超出他的专门学识，他就跟小孩一样幼稚——这就是他缺乏才能、好似一匹拉车的马的特征。我记得有一天早晨我走进办公室，说：

“想想看！多么不幸！据说斯科别列夫^①死了。”

尼古拉在胸前画十字，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转过身来对着我，问道：

“这个斯科别列夫是什么人？”

还有一回（比这回稍稍早一点），我告诉他说，彼罗夫^②教授死了。这位亲爱的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却问道：

“他是教什么的？”

看来，即使帕蒂^①凑着他的耳朵唱歌，即使中国的大军侵入俄罗斯，

^① 斯科别列夫(1843—1882)，俄国将军。

^② 彼罗夫(1833—1882)，俄国画家。

即使发生了地震，他也不会动一动胳膊或者腿，而会仍旧眯细眼睛，心平气和地看他的显微镜。一句话，赫卡柏^②跟他毫不相干。我倒恨不能看一看这块面包干到晚上是怎样跟他的妻子一块儿睡觉的。

另外一个特征是他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尤其是相信德国人所写的一切话的正确性。他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实验标本，知道生活的目的，完全不了解使得天才头发变白的怀疑和失望。他对权威存着奴性的崇拜，缺乏独立思考的要求。打消他的信念是困难的，要跟他争论也不可能。一个人既然深信医学是最好的科学，医生是最好的人，医学传统是最好的传统，那就请您跟他去辩论吧。在医学的不幸历史中只有一个传统流传下来，那就是现在医生们仍旧系着的白领结。对学者乃至一般的受过教育的人来说，只可能有一个共同的大学传统，并没有医学、法学等传统的分别。可是要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他准会为此跟您一直争论到世界末日。

对他的前途我看得很清楚。他这一辈子会准备好几百个非常精确的实验标本，会写出许多枯燥的、可是很平稳的论文，准确地译出十来篇文章，可是却干不出什么大事来。要做那种事业就得有想象、发明和才能，可是彼得·伊格纳捷维奇没有这类东西。总之，他不是科学的主人，而是它的工人。

我、彼得·伊格纳捷维奇、尼古拉，压低了声音说话。我们感到有点不自在。隔着门听见讲堂里像海浪翻腾的嗡嗡说话声，人就会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三十年以来，我对这种感觉还没习惯，可是它每天早晨都会产生。我烦躁地扣上我礼服的扣子，问尼古拉几个不必要的问题，发脾气。……好像我害怕似的，不过这不是胆怯，而是另外一种感觉，究竟是

① 帕蒂(1843—1919)，意大利花腔女高音歌唱家，曾数次在俄国演出。

② 赫卡柏是希腊传说中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之妻，在特洛伊战争中失去了丈夫和几乎所有的孩子，本人也被俘，最后死去，在古典文学中，她成为极端悲痛和绝望的象征。

什么感觉，我也说不清楚，找不出它的名字来。

我完全不必要地瞧了瞧我的表，说：

“怎么样？现在是去的时候了。”

我们就按次序走进讲堂，打头的是尼古拉，拿着实验标本或者图表，接着是我，那匹拉车的马断后，他谦虚地耷拉着脑袋；或者，必要时，打头的是一个上面躺着死尸的担架，死尸后面是尼古拉等等。我一进去，学生们就都站起来，然后坐下，海洋似的喧哗声忽然停了。一片安静。

我知道我要讲什么，可是不知道怎么讲，从哪儿开头，哪儿结束。我的脑子里还没准备好一句话。可是我只要往讲堂里扫一眼（讲堂造得像一个围绕着我的圆形剧场），说出那句老套头的话：“上一回我们讲到……”一长串的句子就从我的灵魂里飞出来，我一口气讲下去了！我很快地、兴冲冲地讲着，打都打不住，倒好像没有一种力量能够拦住我的话似的。如果要讲得好，那就是说，如果要讲得不枯燥，使听讲人得益，那么除了才能以外还得有技巧，有经验，对自己的力量，对自己所讲的内容，对听课的那班人，都得有极清楚的概念才行。此外，要胸有成竹，目光敏锐，一忽儿也不能不注意眼前的那些人。

一个好指挥，在发挥作曲家的思想的时候，要同时做二十件事：又要瞧乐谱，又要挥指挥棒，又要注意歌者，还要时而朝鼓手，时而朝圆号手做个手势等等。我讲课的时候也是这样。我面前有一百五十张彼此不相像的脸，三百只眼睛直视着我的脸。我的目的就是降伏这个多头的怪物。在我讲课的每一分钟里，要是我清楚地了解这怪物的注意程度和理解能力，那它就被我降伏住了。我的另一个对手则在我自己的脑海里。那就是五花八门的样式、现象、法则，以及受它们制约的我和别人的许多思想。我得随时有本事从一大堆材料里捞出顶要紧、顶必需的东西，随着我的滔滔不绝的话语赶快把我的思想装在一个能够使那个怪物听懂而且引起它注意的形式里面；同时又得小心在意，不要把我脑子里积存的那些思想照原样说

出来，而要按照一定的次序讲，这是正确地组成我要描绘的那个画面所必需的。还有，我极力使我的语言合乎规范，使定义简短而准确，使话语尽量朴素优美。我得随时控制自己，记着我所能支配的时间只有一小时零四十分钟。总之，要做的事不少。人得同时做科学家、教师、演说家才成。要是在您身上演说家胜过了教师和科学家，或者倒过来，那就糟了。

讲了一刻钟、半个钟头以后，我就会发现学生们开始瞧天花板，瞧彼得·伊格纳捷维奇，这个在找手绢，那个在椅子上动弹着，想要坐得舒服点，还有人想心事出了神，脸上现出微笑。……这意味着他们的注意力疲乏了。那就得想办法才成。我赶紧抓住机会，说一句俏皮话。一百五十张脸就都现出欢畅的笑容，眼睛快活地发光，一时间又可以听见海洋般的喧哗声。……我也笑了。他们的注意力重新恢复，我可以接着讲下去了。

不管什么样的体育运动，什么样的玩乐或者消遣，都不及讲课那样能够给我这么多的快乐。只有在讲课的时候我才能够生出满腔的热情，我才明白灵感不是诗人的胡诌，它实际上确实存在。我想，我每回下课后所感到的那种舒服的疲劳就连赫拉克勒斯^①在干完耸人听闻的英雄业绩以后也不见得会体验到。

这是从前的情形了。而现在呢，我讲起课来却只觉着受罪。还没讲完半个钟头，我就觉得肩膀和两条腿疲乏得支持不住。我在圈椅上坐下，可是我不习惯坐着讲课。过了一分钟，我又站起来，仍旧站着讲，后来又坐下了。我的嘴巴发干，喉咙发哑，脑袋发晕。……为了要把这种情况瞒过听讲人，我就不断地喝水，咳嗽，常常擤鼻子，仿佛因为着了凉才讲不下去似的。我说些不得当的俏皮话，临了，不到钟点就宣布提前下课了，而我主要是感到羞愧。

我的良心和理智告诉我：我现在所能做的顶好的事就是对那些孩子

^① 希腊神话中一个力大无比的英雄。

讲最后一堂课，跟他们告别，给他们祝福，把我的职位让给一个比我年轻、比我强壮的人。可是，让上帝裁判我吧，我缺乏勇气本着良心办事。

不幸，我不是哲学家，也不是神学家。我十分明白，我的寿命不出半年了。看起来，我目前应当关心的似乎主要是坟墓里的黑暗问题、我在地下长眠后会梦见什么幻象的问题了。可是不知什么缘故，虽然我的头脑充分领会那些问题的重要性，我的灵魂却不肯承认。现在我虽然面临死亡，但却跟二三十年以前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兴趣。直到我咽气的时候，我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身。这种信心也许在根本上是幼稚而不公正的，可是如果我只相信这个，而不相信别的，那却怪不得我。我没法战胜我心中的这种信念啊。

不过问题不在于此。我只要求人们体谅我这种弱点，要求人们了解，把一个关心骨髓的发展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的人硬从讲台上拉下来，硬叫他跟他的学生分手，那就等于抓住他，不等他死，就把他放在棺材里，钉上盖子一样。

由于失眠，也由于极力克制我那渐渐增长的衰弱，在我身上起了一种古怪的变化。我上课讲到半当中，眼泪会忽然使我的喉咙哽住，我的眼睛就发起痒来，我生出一种热烈、急切的欲望，恨不能向前伸出两只手，大声地诉一诉苦才好。我想提高嗓门喊叫：我，一个著名的人，却被命运判处了死刑，不出半年就要由另一个人上这儿来占据这个讲堂。我要大声喊叫，说我中了毒。以前我从来不知道的一些新思想毒害了我一生的残余岁月，老是像蚊子似的螫我的脑筋。碰到这种时候，我的情形显得那么可怕，我巴不得所有我的听众都害怕，从座位上跳起来，心惊胆战，拼命喊叫，纷纷向门口跑去才好。

挨过这样的时光是不容易的。

二

讲完课以后，我坐在家工作。我看刊物和论文，或者准备下一次的课，有时候写点东西。我的工作时常中断，因为我不得不接待客人。

铃声响了，这是我的一个同事来找我谈正事。他手里拿着帽子和手杖走进来见我，把那两样东西向我送过来，说：

“我待一会儿就走，待一会儿就走！您坐下，同事^①！”

先是我俩都极力向对方表明自己非常有礼貌，彼此见面十分高兴。我请他在一把安乐椅里坐下，他也让我坐下。我们一面让座，一面小心地碰碰彼此的腰部，摸摸彼此的纽扣，仿佛我们在互相试探，生怕烫了手指似的。我们两人笑着，其实我们并没有说什么可笑的话。我们坐好，低下头，彼此凑近，压低喉咙讲起来。尽管我们彼此有心真诚相待，可是我们仍旧不能不用种种中国人那类客套来装饰我们的谈话，例如“阁下明察秋毫”，或者“鄙人已经荣幸地奉告”，要是我们当中有谁说了句把笑话，即使说得并不可笑，我们也还是不能不笑一阵。等到谈完正事，这位同事就猛然站起来，朝着我的文稿摇一摇帽子，开始告辞。我们就又摸对方的衣扣，笑一阵。我把同事送到门厅，在那儿帮他穿上皮大衣，可是他竭力辞谢这种崇高的光荣。后来，等到叶果尔开了门，同事就对我说我会着凉的，我呢，却装出甚至情愿陪他走到街上去的样子。等到最后我回到自己的书房里，我的脸上仍旧挂着笑容，这大概是惰性关系吧。

没过多久，铃又响了。有人走进门厅里来，脱了半天衣帽，咳嗽很久。叶果尔来通报说有一个大学生来了。我吩咐一声：请。过了一忽儿，

^① 原文为拉丁语。